

朱振和 著

短 敬 集

前 言

老来无事，不辞昏聩，每于读书、阅报、上网、回忆之余，辄将所得随手记下，犹如执一短檠，照亮我脑际一片静谧之区，意只自娱并与友者交流耳。

2011年1月1日初稿

2011年12月16日改定

本书目录

一	办好一流大学之我见	1
二	也谈应试教学	4
三	我经历过的一次国文高考	6
四	任性和任意性	8
五	君子当慎其言	10
六	罚当其罪	12
七	一则疑联的解释	13
八	但问苍生莫问神	15
九	这里需要的是博闻	18
十	科学与玄想	20
十一	赵阿贵与顾阿桃	22
十二	我读周有光	24
十三	理想与信仰	27
十四	汉字的现代风波	29
十五	当代诗词的位置	31
十六	钱袋和脑袋	34
十七	爆竹的“文化”	36
十八	关于公民意识	39
十九	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41
二十	纪念袁雪芬	45
二十一	从“李约瑟难题”谈起	47

二十二 从屈原到宋玉	51
二十三 牛顿三大定律之“外一章”	55
二十四 秽物何须展览	58
二十五 谁知局外却有人	60
二十六 地球啊！母亲？	62
二十七 写一个越剧版的《琵琶行》如何？	65
二十八 越剧《琵琶行》场序初探	68
二十九 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教育改革	76
三十 旅游杂说	79
三十一 春江花月夜	83
三十二 小议天安门广场孔子雕像之去留	85
三十三 要创造条件让人民说真话	88
三十四 化学怎么啦？	91
三十五 从《慈禧西行》的一组镜头说起	94
三十六 话说“权谋文化”	97
三十七 颠地和法拉第	99
三十八 木鱼何妨天天敲	101
三十九 文科打假难觅方舟子	104
四十 徊 徨	105
四十一 一个躲不开的话题	107
四十二 “一个躲不开的话题”中的话题	109
四十三 不丹的启示	112
四十四 莫拿委员开玩笑	115
四十五 红楼戏曲中的《葬花吟》	117

四十六 荧屏戏曲不只唱词要打字幕	121
四十七 抹不掉的记忆	123
四十八 玩 片	125
四十九 我参加了一次今年的高考	128
五十 锡文读后感	129
五十一 从侧隐到是非	134
五十二 记 梦	136
五十三 晚 节	138
五十四 爱 莲	140
五十五 文化宣传要合乎理性	141
五十六 美哉宋庆龄	146
五十七 学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考试	149
五十八 大一新生的基础课该由谁来上	150
五十九 红歌及其它	153
六十 早卒未必是件坏事	156
六十一 关于应用文的写作	159
六十二 请离势利而远之	161
六十三 两“袋”余议	163
六十四 大学校长都该当上演说家吗	165
六十五 回望天堂里的贪官	167
六十六 大学成为旅游地	170
六十七 众说纷纭咏雪词	173
六十八 从姚雪垠先生的一首《咏史》诗说起	176
六十九 好个问责制	178

七十	早年记忆中的斯翁	182
七十一	蝓 蝓	184
七十二	辛亥烈士敖嘉熊先生传略	186
七十三	辛亥百年忆中山先生	188
七十四	断了尾巴的狗和戴了口罩的狗	191
七十五	话说“老歌”	193
七十六	斯人只合宅扬州	197
七十七	忆陈阜	201
七十八	中秋的夜空	205
七十九	乱了方寸的运动	207
八十	用理科方法研究文科之一例	212
八十一	有感于梅普组合的角色互换	215
八十二	《窑洞对》可作中学教材	218
八十三	随心所欲的法学理念应予叫停	220
八十四	出国潮与归国潮	223
八十五	标 签	227
八十六	秋游崇明	229
八十七	弹词中的“调”与“派”	232
八十八	螃蟹的故事	233
八十九	喜见小学有教授	235
九十	看张秋歌如何演袁世凯	237
九十一	升官图	241
九十二	谁撑起了“文革”中的这月天空	243
九十三	谣 言	246

九十四 李先念的腰包	249
九十五 又见“英雄”	251
九十六 影响与促进	254
九十七 从“永字八法”谈起	256
九十八 刘半农与赵元任	257
九十九 思维科学训练应从中小学发微	262
一百 夜深沉	265
附录	269

办好一流大学之我见

如何办好我国的第一流大学？已成为最近一段时期的热门话题。随着前年“钱学森之问”（我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和去年我国何时能得诺贝尔奖等问题的提出，表达了我国学术界一个共同的情结。这三者虽有语言表述上的不同，但总的意思是一样的。

如何办好我国的第一流大学？众说纷纭。我从报刊上看到的各家意见，可说没有一个是瞎说，但最切中肯綮的应是两条，即办好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的学科，办好一流学科要有一流的人才梯队。

一流的学科要有一流的科学家去建设。一流的科学家应能从学科中找出世界前沿的问题，应对这类前沿问题的价值有睿智的认识，一般说来就是指科学的思想性和创新性，如此才能高屋建瓴地开展他的课题研究。随后的步骤是，确定工作的路线和做好工作（以实验科学为例，就是确定实验路线和做好实验）。这要牵涉到工作方法的问题。其实，工作方法的提出和上面所说的科学思想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科学思想上的创新，就谈不上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而没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科学上的创新又往往难于实现。最后，依靠上述科学思想和工作方法创新所获得的实验数据，找出脉络，寻出结论，写出论文，这就完成了从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总结问题的研究课题的全过程。在这全过程中，作为领军人物的科学家应是指导整个工作的灵魂。

然而，从国际的高要求来说，一流的科学家并不是每个大学都有的。有，固然好；没有，就得从四流、三流、二流的科学工作者中培养起来。其实，这个“流”也是相对的。一所名校，总有它相对来说的一流学者，依靠他自己的学养以及对后

辈们的言传身教，应能培养出一个较高水平的学术梯队来。人们在这个学术梯队中，切之磋之，磨之砺之，日后自能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现在人们着急的是，为什么那些高水平的成果不能立时获得？

事实是，世界上一些排名靠前大学，它们大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且它们的优良学术传统很少有过长时期的中断。我们的做法，应是参考它们办学的经历和经验，很快地赶上去。搞学问不同于搞某种单项的经济建设，学问是一种思维活动的结晶，只有提倡激活人们的思维，才能激起人们对学问的追求。

中国的办大学（或研究院、所）曾经是一个拖沓的过程。辛亥革命以来，先是有一批留学生，带着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思想来办学。当时他们所看重的是学科的布局，例如最早的几所名校和中央研究院，开始布置学科和亚学科，敦聘人才，并不断派遣留学人员，回国后作为后备梯队（文科则侧重于国情的研究，有些学科领导人慧眼识英雄，连小学毕业的也能被聘为教授）。当时的教育是英才教育，因为非英才不足以撑起学科的建设。抗日战争延迟了我国学术的进展，当时大学内迁，培养的人才数量不足，难为兴国之大大用。解放后的新中国，大大地扩充了招生规模，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学科，数量上也得到了扩展。但是办学的方向和方法屡经迁曲，有些年代甚至遭到摧折，这种情况直到八十年代才有所改变。因此，我国的大学，即使是名校，它们在学术起点上要比国外的名校低得多，这是一个基本认识，不承认是不行的。

现在是举国都在呐喊“科教兴国”了。最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大学确实有了起色。虽然目前大家都在为大学挑刺，但这种挑刺，自然远胜于三十年前的不挑刺。挑刺是好现象，是对新时期办新大学的一种热望。有了热望，才有了动力。

不过我们也都知道，办教育是个系统工程，每一级学校的教育，都要搞得扎实。现在我国的义务基础教育是九年制，基

基础教育要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但就其中的智育来讲，教育要注重遵循学生的智力发展规律。学生的智力（观察力、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等）都是受学生的生理—心理条件制约的，后天的努力虽然重要，但也不能用过重的学习负担来代替智力的启发，否则反而会抑制学生的学习兴趣。普通高中是学生智力（特别是思维能力）发育的快速成长时期，同时也是学生情感因素（其中包括了自制、热忱、坚持以及自我驱动、自我鞭策的能力—本世纪初也有人把它们叫做情感智力）发展的猛进时期，对待这一时期的学业应该文理并重，以使人们大脑中主司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两半球，都能得到充分利用和发展。所以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家主张高中不要文理分科。他们甚至主张综合性大学头两年的课程也要文理兼顾，以拓宽其知识面。大学生有了较宽的知识面，也就有了较宽的时空想象观念和较强的应对能力，在今后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工作中，就能依靠其聪明度而发挥更好的创造作用。

有了好的学生，大学（包括本科和研究生院）便有了好的生源。当聪明的学生进入了专业（学科）的学、研阶段，此时导师便可以舒展其本领，师生共同刻苦努力，精诚团结，办好大学了。

在我看来，一所综合性大学（尤其是力争办成一流的大学），理科和文科应是这所学校坚强有力的两个重镇。理科要有很好的实验设备，文科要有丰富的图书资料。大学的经费要合理地落到实处，发挥其最好的作用，收到其最大的效益。中国大学的理科设备，比起西方来是不足的，但现在正逐步加强。文科的资料则有很多局限，补充也有诸多难处，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过去名师们所倡导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无法得到贯彻。综合性大学的文、理科，有如一只鹏鸟的双翼，现在一翼长（长得也有限），一翼短，让它怎能展翅高飞？所以有人提出来，我国若要办好一流大学，还有一个“土壤”的问题。

这个土壤就是政治土壤，这个政治土壤是要用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的。

1月6日

也谈应试教学

纵然近年来有些大学名校，采取了单独提前招生或集体提前招生的措施，但全国（或省、市）的统一高考仍不可免。统一高考之不可免，也就是应试教学之不可免。

目下提倡的是素质教育。但素质教育之后，还得应试。现在大家提出的办法是，应试要应素质之试，而非过去之“划定范围，多做题目”之试也。

过去高三复习，每门课程都有一个复习应试的考纲。这个考纲是指挥棒，只要把考纲范围内的所有内容要求都弄得滚瓜烂熟，应付高考自能游刃有余。为了拉开考试分数线，高考出题者就得出些疑难杂题，而中学的高年级教师便要迎难而上，以更高的难题去要求学生。前些年我曾见到某出版商编印的“一课一练”丛书，几乎每门课程都有。如果各课程都按这办法去做，那么学生的课余时间恐怕都要被“题海”所淹没了，又哪里去找素质？

素质教育，说说容易，做起来却难，关键问题在于高考出题者要能拟出符合素质教学的题，而不是填鸭式教学的题。哪一个中学不希望学生的升学率高，哪一位学生家长不希望自己孩子能读上升学率高的中学，这就难为了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

有不少学生家长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可我不是中学教师，我也不知道教师对高中生应试大学有什么妙招，更不知道高中毕业生如何主动去应这个素质教学的试。

于是我只得将我在大学低年级教学中如何寻找素质教学的例子来回答提问者。

有一次我在某工学院兼任大一普通化学课。在“稀溶液的依数性”一节中讲到了“渗透压”，我在讲完渗透压的原理、测量和计算方法之后，下课时在黑板上留下了一道思考题：“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其后果如何，试申述之。”课后，就有人向我反映：你是不是以俚俗市井之语和我们开玩笑？我当时不答。在下一课堂上，我就反问学生：何谓玩笑？我不是已将渗透压的原理告诉了你们吗？我说到动植物的细胞膜都是半透膜，膜的两边如果溶液的浓度有差别，稀溶液中的水分子就会通过细胞膜向浓溶液的那边扩散。现在牛粪中的肥料浓度过高，鲜花茎中植物细胞的细胞质浓度过低，如此则不是植物吸收肥料，而是植物内的细胞液向外倒流，这样植物不就要枯死了吗？学生听了，便纷纷点头称是。

又有一次，还是那个学院和那门课程。我在期中考试时，把讲完的“晶体结构”一章的内容以文字题的形式来考学生。我在一段一百字左右的短文中，埋了5个钉子，要求学生能把这5个钉子找出，以准确的文字表达来完善原文。考毕，却没有一个人能答对全题的，连答对一半的人也不多。考卷发下去后，学生便去教务处告状，说我出了偏题怪题，要求找我评理。我请了部分意见大的学生一起到教务处，向大家一一解说了埋下钉子的理由，请大家思忖一下，究竟有哪一处是偏离了晶体结构这章重点的？当时大家听了无话可讲，反说我的题目出得太好了。

我在本校任小班教学时，常对学生说，你们不要总对中学里惯用的客观题（是非、选择、填充）感兴趣，答对客观题有

可能是“蒙”的，那只对阅卷人批改大批量作业时带来方便，倒是有些主观题（问答题）或口试能考出学生的水平。学生在答主观题或口试时，有时要阐述自己的观点，一些不正确的东西就会冒出来，这时教师就会及时指出学生学习中的不足。例如有人问：化学研究的是什么？你就该回答：化学研究的是原子—分子这个层次上的物质运动。一个三棱镜能将太阳光色散成各种颜色的可见光谱，那是物理；而由铁元素组成的各种物质能制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的各色溶液，那是化学（因为那里有分子或离子的运动）。化学运动上承物理，下启生物，是物质运动中承上后下的一个重要环节。瑞典的诺贝尔奖每年都要发一项化学奖，可见化学对人类之重要。

温课迎考阶段，我喜欢仿效电视台谈话类节目的方式。我把学生分成团队，自己当节目主持人，一起掌握课堂气氛，而主动权则由教师操纵。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可以相互启发。我发现这种做法可以提高温课的兴趣。试问，这是否也是素质教学的一种表现？

高考不可免，把素质教学溶入应试教学应该是个方向，我之所谈，也许是隔靴搔痒，不过仅供参考吧了。

1月6日

我经历过的一次国文高考

记得本世纪初，中央电视台在访谈类节目中，有过这样一个情节：崔永元拿了一张本年度的高考语文试卷，大呼看不懂，

水均益、白岩松凑上去一瞧，竟有同感。卷面上有选择、填充等客观题，也有作文等主观题。总之，题目琳琅满目，但大部分题都难答完美，有的甚至答不上来。他们认为，这样的试卷让他们来考，很可能不及格。后来听说做过文化部长的大作家王蒙看了，也说他只能勉强答个及格。可见，这样的语文考试是太难为人了。

我们年轻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高考。1948年，我投考苏州东吴大学时，国文（那时的语文课叫国文课）试卷只有一个作文题，题目是：“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试申论之。”我看这样的作文题考得很全面，能考出学生的水平来。

首先，解说题中的要点，需要有故事，这就是考你叙述文的能力；故事要说得有感情，使人悦服，这就是考你抒情文的能力；说完事，抒完情后，更要紧扣题意，作出结论，这就是考你论说文的能力。叙述、抒情、论说，三者皆备，这不就是考各类文章的写作要求，这不就是考国文的要求么？

东吴这个作文题，按题目文字来说，最好是写文言文。但如果不写文言而写白话，似乎也不能说违规。不久前我和人谈起这个问题，与谈者认为，不妨再加试一道不加标点的文言文，要求考生用正确的现代标点符号，将全文一一断句，读上去既能达意又能悦耳。文不能长，又不占多少分数，这应该是最合理的了。以上办法，请单独招生的院校，不妨一议。

1月8日

任性与任意性

孩子挑食、打架、玩游戏机乃至影响学业，谓之任性。大人们钟爱孩子，起初总是哄着、护着。及至闹到胡天野地的时候，不免要起而管之、责之，使他能改邪归正。大人也有任性的，高兴怎么做便怎么做，这是从小养成的习惯，长大了改也难。至于大人中的大人，要去管他、责他、改正他，那就更难了。他有时会忽发脾气，无法无天，众人只得唯唯。这种任性无人能治。

还有一种被哲人们叫作“任意性”的东西，那就有点学术的味道了。因是学术，故而一般人难窥其堂奥。兹稍以自然科学的角度解释之。

有人做实验，把结果（数据）绘在一张二元体系的直角坐标图上。如果将各个数据连结起来，得到一条直线，那说明坐标的两边 X 和 Y 之间有着线性关系。因为实验（特别是手工做的）难免有误差，所以实验数据难免有些散落，即并不完全落在那条直线上。此时我们可以“最小二乘法”来处理这些数据，处理的结果，发现数据紧靠着那条直线即有偏离也很小，因此我们仍能说，X 与 Y 间有线性关系，即它们间的关系可以用直线方程式表达之。

另一种情况，如果实验的方法没错，而实验的数据却很零乱，看不出 X、Y 间有什么线性关系。例如你总共做了 10 个实验，其中只有 3 个数据可以连成一条直线，其余 7 个都和直线偏离得很远，即用“最小二乘法”也无能为力，那么这个直线方程便不成立了。如果实验者强辩说，数学上两点之间可成一直线，何况我这里有 3 点呢！我想，这种说法都会被人嗤笑的。

如果我们把以上的实验例子移用于政治，其结论应该是有可比性的。例如我们考察一个政治家，我们应考察他从政以来

一生中的言论和行为。既不能单独颂扬他一生言行中的亮点，也不能单独贬斥他一生行为中的黑点，换言之，应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例如说，政治家在正式场合的讲话，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后又经过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最后形成文字，这些文字往往是有价值的。他一生中有多次这样有价值的文字，如果单独把它们串联起来，就可被人认为“好得不得了”。然而，他一生中还有更多无价值甚至错误的讲话和文字，却被拥护他的人删去或弱化了（对其行为的处理也一样），这样，对他一生的总结（评价），便变得没有意义了。如果你硬把前面串连起来的东西说成是方程式似的“思想体系”，那是一定会被别人嗤笑的。

然而处理政治比处理自然科学要困难得多。自然科学的数据是不能随意解释的，而政治数据却可被随意引伸——从一句话中衍生出一百句话的意思。有些人是专门吃这行饭的，旁人如果对内情不了解，也对他们无可奈何。

最近还发现，有些政治人物在国内主流媒体上发表署名（据人揭露其实署的也是假名）文章，硬说民主没有普适性，有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及“社会主义民主”之别。细读这些东西，你不难发现，此人（或此类人）的办法，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些坏东西捆绑起来，命名为“资本主义民主”，又把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一些好东西捆绑起来，谓之“社会主义民主”，两相对比，自然得出社会主义民主是真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是假民主的结论。如果反过来，把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优点和现行社会主义制度中的缺点拿来比较，又会得出什么结论呢？

其实，民主是有普适性的，各种社会制度下的民主也是可以相互学习的。中国的民主概念本来就来自西方。我们过去专制的东西太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致上能做到政通人和，某种意义上也是不断学习西方的结果。同时西方也在学习中国。两种制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进步，不要说得远，也

不要举大量的例子，就比一比最近五十年，这道理就可以使大家明白的。

以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搬动政治科学的脚步，使后者成为真正的科学，困难还很多，但吾人不能因此而不做。

1月10日

君子当慎其言

1972年中日建交，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毛公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毛公说：“不要说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略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把蒋介石打败呀！”他向田中角荣表示了对日本的感谢。“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日本对中国的巨额战争赔偿本有准备，经此一说，便被全部豁免了。

在此之前，1961、1964年，毛公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谈话时也有类似腔调：“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又说：“日本皇军是我们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毛公说的这些话，也许是他的真心话。但这些话却把他过去常说的“中国战胜日本全是共产党的功劳，而非国民党的功劳”不经意地否定掉了。试问这样的话是他应该说的吗？